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编

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第二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五次反“围剿”的策略与失败

1933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到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这次整编取消了军，师编为团，小团编为营。红五军一、二、三师编为红四师，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五师。中革军委决定将兴国模范师整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

兴国模范师是由兴国地区的赤卫队组成，平时不集中，分散在各区乡活动。该师在6月1日才刚成立，接到整编命令后，由地方干部把队伍就地集合起来，交给接收单位。师团干部都是由地方干部临时担任，整编以后他们仍回地方去。红三军团派政治部某部部长曹其灿带一批干部去接收、整编兴国模范师，我也被派去了。我们去了之后，军团发来个电报，决定该师整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团，并任命了团的领导干部。被任命为师政治主任的曹其灿，看到同他一起来的干部都有了任命，唯独没有安排我的任职，感到很奇怪。但也不便和军团联系。他对我说：“你到师政治部当组织科长吧。”我很干脆他说：“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就当了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曹其灿派我和十六团政委胡正国一起去兴国县城接收第十六团。

我们把红六师整编好，带回大湖坪。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的任职命令译电员译错了。原来，军团电报任命我为十八团政委，一位叫汪玉明的教导员为政治处主任。因为我当时叫王明，译电员自作聪明以为是一个人，就译成政委王玉明。汪玉明当了团政委，我就没有了职务。回来以后虽然发现错了，但已成事实，也不好再更变，只能将错就错了，反正那时谁也不计较职务高低。后来我改任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红十六团团团长是曾春鉴，政委胡正国，参谋长彭雄，朱涤新当特派员，黄志勇当俱乐部主任。这时军团滕代远政委调中央工作，杨尚昆来接任军团政委，陈阿金来当红六师政委。

1933年7月，中革军委下令，红二军团第四、第五师组成东方军进军福建，第六师在大湖坪整训。东方军出发前，红三军团在大湖坪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东征任务。誓师会后，东方军出发，六师留下在大湖坪整训。红四师、红五师出发前抽调了一些骨干充实到六师当连排班长，六师的地方干部除留下个别当副职外，其余又部回了兴国。整训期间我专门请了兴国籍的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肖华来作动员讲话，还请随营学校政委李志民来指导训练。我们抓紧对部队进行短期政治军事整训以后，迅速去福建归队。到了福建，红军团主力已攻占连城、清流、归化、洋口、缴获、俘虏很多。接着主力准备攻打延平，红六师奉命围攻将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乐,保障军团主力后方,结果久攻不下,红十六团团团长曾春鉴负伤,十八团团团长李寿轩调来接任。延平方面也因地势不利于围困和袭取,打了一场恶仗,主力伤亡很大。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协助下,纠集了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中共临时中央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之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在黎川失守之后,李德即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撤围,赶回黎川地区,进攻硝石、资溪桥的敌人,收复黎川。

红三军团入闽作战3个月,没有休整,就迅速向黎川前进,在黎川东北的询口,和敌赵观涛的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彭德怀军团长当机立断,将该旅三个团截住,全数围歼。当红三军团不顾疲劳赶到硝石集结进行战斗部署时,才发现已深入到南城、黎川、南川之间,四面有敌人重兵和堡垒群,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彭德怀军团长向中央请示,连夜撤出,使红三军团脱离了险境。

红军在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下,在临川、黎川、金谿地区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转战,白天遭敌机轰炸。晚上只能露天宿营,弄得疲惫不堪,连续在资溪桥、洪门攻击失利,然而,李德并不接受教训,他又命令红七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远离苏区的抚州附近浒湾,说是可以调动敌人北援。红七军团在救浒湾打了一天,没能攻下。当夜敌徐廷瑶的第四师从西面来援,红军立即在浒湾的八角亭、大仙岭一线构筑阵地阻援。敌第四师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很快就占领了八角亭,红七军团受到敌人夹击,红三军团第四师即去增援,连续攻击都没成功。打了两天一夜,敌人已经构筑了巩固的阵地,红军伤亡很大,又得不到补充,只好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红四师十一团政委吴宗太牺牲,调我去接任。红十一团是平江起义的老底子,战斗力比较强,团长们仍是邓国清,政治处主任原来是甘渭汉,他负伤后由向仲华接任。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由黄克诚接任,师长是张锡龙,参谋长张翼,政治处主任李井泉,后由吕振球接任。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两个多月,红军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转移到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完全陷入被动局面,受到很大损失。11月下旬,驻福建的国民党蔡廷锴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宣布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抽调六个师前去镇压,对红军来说,这本来是很好的机会,但却不去利用,蔡廷锴曾和红军团接触,以后又派他的师长周士第(老共产党员)回到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要求和红军联合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有鉴于此,彭德怀军团长向中央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或尾随进福建的敌军后边打,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临时中央对这些都不予理采,认为是机会主义,反而让红一、三

党的民主革命篇

军团分开行动,进行训练、修筑堡垒,坐视蒋介石的军队镇压十九路军。

这时,红三军团三个师组织过一次对抗演习,地点在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广昌以北头陂地区的三角地带,由红六师担任防御,红四师和红五师合编组织进攻。十四团和十一团合编,十四团的团长、政委任副职。彭德怀军团长任演习总指挥,整个演习上边有决定,提出的口号“要以少胜多”,强调防御要积极出击,牵制敌人,不能死守。军团政治部组织巡视员跟着各团营行动。出题目、出情况,考查营团干部,在总政帮助工作的中央政府经济部长吴亮平和军团组织部长吴溉之等跟着我们团行动。演习中,对连队的要求则强调夜问行军和战术动作的训练。据我所知,这是红军时期我军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演习。

12月中旬,蒋介石为隔断江西红军主力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急派其第八纵队向团村进犯,中革军委决定突击围歼这个纵队。彭军团长指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按预定时间,向敌人发起反击,由于各军团配合不够,没有形成合围,只将敌人击溃。

那天天气晴朗,打到下午,我们红十一团接替红十团任务,由东面攻击团村。我们正好面对太阳,强烈的阳光刺得我们直流眼泪,看不清敌方,而敌人顺着阳光,看我们却一清二楚,敌我机枪对射,部队冒着枪林弹雨行动、这时师长张锡龙过来向前方观察,被敌人机枪打中牺牲。张锡龙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理论修养和指挥能力都很强,打仗也很勇敢,他的牺牲是红军的一大损失。这一仗没有吃掉敌人,我方伤亡却很大。部队撤退时动员指战员们用担架抬伤员,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带头参加。

敌人在团村受挫以后,蒋介石为集中力量对付十九路军,暂时对红军采取了守势。这时红军本应积极向东线进攻,而中革军委反而命令红三军团在江西头陂地区集结,准备调往西线永丰地区打敌人的堡垒阵地。

十九路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装备补给终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蒋介石优势兵力攻击下,放弃了顺昌、将乐,使福建苏区受到威胁。为保卫苏区和吸收十九路军的部分士兵到红军中来,中革军委又决定红三军团暂不去永丰,再次入闽作战;红一军团到黎川、泰宁进攻敌人的堡垒线。

1934年1月上旬,红三军团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出发,到达福建沙县围攻国民党驻军卢兴邦的新编第五十二师。红五师担任主攻,红六师担任助攻,红四师担负打青州方向援敌的任务。我们在青州附近将增援沙县之敌第四师的一部堵住,双方交战,我毙伤敌军二百余人,并缴获了卢兴邦设在尤溪县的一个兵工厂。

沙县城城高墙厚,城内驻军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坚固守。红五师和红六师的炮火被敌压制,第一次架云梯登城未成,遂改为坑道爆破攻城。军团调红四师参加战斗。25日凌晨,红五、六师爆破沙县城西门成功,红四师三个团分三路冲进城里,接着五师,六师也杀了进来,与敌展开巷战,很快就将城里守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战斗中十团参谋长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姚哲负伤。

打下沙县后，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卢部名义向敌发电报“求援”，敌人信以为真，连续派飞机给“送”来了大量弹药、钞票。我们悉数接收。真可谓名符其实的“运输大队长”。红三军团在沙县缴获大批物资和食盐，全部运回瑞金，敌人刚运到沙县的新军装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由于临时中央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军事上完全听李德的瞎指挥，这一段时间搞得红军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蒋介石百万“围剿”大军步步紧逼，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象叫化子一样。这次打沙县，部队有所缴获，红三军团全体人员都换上了新衣，干部还发了大衣，从上到下焕然一新，全军高高兴兴，愉愉快快地在沙县过了一个旧历年。

大年初一，中央来电，调红四师由沙县赶到建宁、泰宁地区，归红一军团指挥参加打黎川。红四师在沙县只休整了3天，即行出发，开往泰宁。我们红十一团为前卫，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作战科长聂鹤亭在那里等着我们接防。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一年多了，首次会合，分外亲热。红一军团穿的不如我们，供给也困难。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军团一部分，林彪看到我们每个干部战士的子弹袋都装得满满的，又对我说能不能给点子弹，我说给弹药要报师里批准，在这里他把阵地移交给我们，带着一军团的部队向预定的地域转移。我们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山地和敌人对峙了个把月后才后撤到南丰、广昌以北地区，归还红三军团建制。

3月间，蒋介石镇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又调集兵力从东面、北面向中央苏区猛进。敌北路军七个师，中南丰向广昌推进，侵占厂三溪圩一带。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第一、三、九军团进行反击。但是敌人所占阵地都是岩石山，碉堡非常坚固，他们固守不出，红军进行硬攻，伤亡两千多人，只得撤出战斗。

东路的敌军连续攻占将乐、泰宁，并和北路军协同构筑泰宁、新桥、得胜关的封锁线，准备进占建宁。

红三军团奉命赶往东线，在太阳蟑、新桥阻击敌军。但是敌人拥有优势兵力，新桥还是被敌人占领。我们红四师在太阳蟑和敌人对峙。这时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一天，上级传达他的指示，命令我十一团派出一个加强排，带着两挺重机关枪占领一个突出部位的山头，这个排派出以后，第二天团里派青年干事带人去送饭，正遇上大雾弥漫，雾雨流云笼罩了大半座山。他们去转了一圈，回来报告没找着那个排。这一下可惊动了上级，李德、王稼祥、博古闻讯后都到我们团部来了，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气喘吁吁地赶来。

他们来到我团，又开会又调查，叫我介绍这个排的情况。从排长、班长到战士的家庭出身，战斗中的表现，都问到了，分析这个排是不是投敌了，搞得气氛很紧张。对这个

党的民主革命篇

排,我心中还是比较有数的。这个排是全团比较好的,老战士较多,党团员骨干强,班排长精明干练,全排作战勇敢,出发前我给他们作了动员,对他们单独出去是比较放心的。但是战场上情况多变,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如果这个排果真投敌了,我们团领导就不好交代,上级领导必然拿我们是问。

这个排究竟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也有点纳闷。

我决定立即亲自带人去找。我们沿着这个排出发的路线走到实地一看,那不是个孤立的突出山头,而是一座高山。我们一步一喘地往上攀登,爬到半山腰就可以遥望黎川平原,这里已经超过机关枪的射程,根本不需要到山顶设警戒阵地。我们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排,只好暂时休息吃饭。这时我心里上下直打鼓,不觉也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了。过了一会,一阵风吹来,云开雾散,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小山峰,我们跑过去一看,那个排就展开在那里,他们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让他们赶快吃饭。这时我的心里就象一块石头落下地来,松了一口气。

我回到团部向李德等领导人报告了情况,随后招待他们吃过饭,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事后彭老总知道了这件事,生气地说:“连一个团放个哨他们也要管。如果一切都听他的,非把红军葬送了不可。”李德这个脱离实际的图上作业专家,只凭一张不大准确的地图指挥红军打仗,哪有不失败的!

4月初,敌北路军准备大举进攻广昌。中革军委又急令红三军团主力从福建沙县回师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

敌人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盱江两岸边筑垒边推进,红军在两岸节节阻击。敌人上有空军支援,下有炮火开路,步步进击;红军弹药不足,火力不济,且战且退。当敌军一个旅集结在广昌东北,盱江东岸的饶家堡时,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指挥红四、五师乘夜围攻这个旅,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很大,饶家堡阵地六次易手。后来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在天亮前撤出战斗。

红三军团渡过盱江,退守广昌西北地区。

广昌没有城墙,无坚可守。博古、李德到前线指挥,要红军修筑“永久工事”固守,并动员在广昌和敌人决战,“打最后一仗”,还要求师、团、营、排干部都要指定代理人,准备苦战。我们修的土木工事根本不堪一击,敌人用炮兵轰,用飞机炸,战士们在残存的工事里挨打,要固守根本不可能。

我师黄克诚政委是不赞成死守广昌的。他曾多次给我讲,“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顶得住呢?他主张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战术原则,避开强敌锋芒,作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鄂赣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他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那时,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他也无可奈何。

彭德怀军团长根据部队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再三向李德提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 12000 人将全军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他建议采取机动防御，少数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部队隐蔽在城西南十里外的山地，相机侧击我阵地的敌人。这一建议总算得到李德的同意。

在保卫广昌中，红五、六师伤亡很大，敌人突破了我军阵地，冲到军团指挥部前面。我们十一团是军团的预备队，由军团首长直接指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团奉命反击，两个营首先冲了出去。指战员们冒着八架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高喊着“冲啊”的口号，一股劲儿向敌人猛扑过去，终于把冲过来的敌军打退。这两个营大部分同志阵亡，战后有一个统计，连队多则剩下 40 多人，最少的只剩十来个人。彭军团长在指挥所看到指战员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迟疑，没有一个人卧倒，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的确，红军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战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每个干部战士都明确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那样艰苦，伤亡消耗那样大的情况下，指战员仍然能够上下一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坚持了 28 天，最后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下，不得不撤出。这一仗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红军自己却损失了总实力的五分之一。红三军团伤亡人数更多些，约占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如果按博古、李德的意见固守广昌，红军将是全军覆没后来彭德怀军团氏骂李德“儿卖爷田不心疼。”

广昌失守以后，红三军团只在广昌西南的头陂地区休整了几天，又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那时每天都在打仗，而且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没有油盐吃，伙食跟不上，干部战士体力日趋下降。

7 月上旬，敌人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围剿”，以 31 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对红军进行全面进攻。红军本应突出根据地以外，寻机歼敌，然而中革军委却要求一切力量誓死捍卫苏区，采取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负责在驿前以北和石城地区，抵御敌人 9 个师的进攻。此时红军每师不足 4000 人，而敌军每师达 9000 人，兵力相差几倍，况且装备和弹药供给也都不及敌人。这样死打硬拼，无论如何红军是拼不过的。

红三军团四师和五师，在高虎脑和鹅形两处险要阵地抵御敌人。敌人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大炮轰击，而后步兵进攻，我们红四、红五师密切配合，奋勇抗击，激战 3 天后退出战斗。红三军团在驿前镇以北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埋地雷、堆鹿岩、埋竹钉，修了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红军的工事基本上是土坑上面盖树枝，经不起敌人飞机炸、大炮轰，部队只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军血战。子弹打完了，又得不到

党的民主革命篇

补充,我们只得在晚上组织小分队摸到阵地前从敌人横尸堆里拣枪枝弹药。

红四师在蜡烛形计划打一个反击。部署红十团在蜡烛形一侧、红十二团在保护山一侧掩护,红十一团在中间的一个山口子担任反突击。8月28日拂晓,敌人集中三个纵队的兵力,在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大炮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左侧红十团英勇奋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不料红十二团一侧出了问题,在夜间敌人从外侧的两个口子爬上保护山,在山头上警戒的红十二团五连与敌人反复冲杀、格斗,大部壮烈牺牲,敌人占领了制高点。我红十一团由准备打突击转入打阻击,掩护红十团和红十二团撤退。敌人用火炮向我们射击,飞机在我们头顶俯冲扫射,爆炸的气浪硝烟,腾起的沙石尘上弥漫上空,什么都看不清楚,我蹲在一个小工事里拿着电话机联络,一颗迫击炮弹打在旁边“轰”的一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我们一直坚持到红十团、红十二团全部转移,才撤出战斗。

蒋介石凭借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连续进攻,红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我们撤到驿前镇最后一道防线。在一次反突击中。队军团机关新派来的一个指导员,还没有打过仗,在敌人的猛烈炮火面前被吓坏了。临阵退缩。邓国清气得拔出枪来要毙他。我赶紧过去把他的枪口压下。我给团长说,不能这样做,他没有实战经验,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我命令这个指导员追上去,和部队一起冲击,结果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后来在另一次战斗中这位指导员英勇牺牲了。

敌人继续向驿前镇进攻。我和邓国清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从他后背两侧穿过,打到我的皮挎包上,没有伤着我,实属侥幸。团长伤得不轻,我们立刻把他送到医院。驿前镇终于失守,红三军团退到镇南的桐江、小松布设防、休整。团长住院,只有我和参谋长廉胜杨指挥部队。我们在这里防守了个把月。这期间敌人步兵天天出击,飞机、大炮不停地轰炸,敌我伤亡越来越多,阵地陈尸数千,顾不上掩埋,腐尸恶臭难闻,无数绿头苍蝇爬满地,飞起来能遮天蔽日。酷暑8月,疟疾、痢疾一起暴发,许多指战员患上传染病。当时有个统计,我红十一团共有21个单位,这一个多月里平均每个单位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伤病亡达9人之多。这时我的痔疮突然发作,疼得走不动路,战士们把我从火线上背了下来。红四师参谋长张翼见我退下来,他替我去指挥,上到前线他却钻了空子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参谋长投敌,必然暴露红军整个部署,军团当机立断、撤到石城以北组织防御。

我从阵地下下来以后,卫生队长靳来川为我做了手术。当时没有麻药,我硬是咬牙忍痛让他割了五刀,手术后勉强可以骑马行动。彭德怀军团长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他自己也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行军打仗和部队一起走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他碰到谁没有伤病骑马,准得批评,他常说:“年轻的骑牲口干什么?”这次退到石城一带,差不多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一天,军团通知我们到山上看阵地,大家都疲惫不堪,我们红四师的干部都是骑着马去的。快到的时候,远远看到彭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老总已经在山上，黄克诚政委轻声对大家说：“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大家慌忙下马牵着往山上走。我手术后伤还未痊愈，没有下马。洪超师长也没下马，他说：“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是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到了山上彭军团长问：“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伯，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洪超说。

彭军团长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心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大疲劳了。我也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了就骑马吧！”

后来军团通知各团的供给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临时中央，在红军的作战指挥上完全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方针路线。先是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搞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后来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与敌人拼消耗。一年来，红军到处转战，几乎天大部在行军打仗，大大小小战斗不计其数，但是好仗没有打几个，指挥员感到窝火，战斗员感到憋气打来打去，红军越来越弱，根据地越来越小。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蒋介石准备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避免与敌人决战，保存有生力量。其时博古、李德等人已被敌人的汹汹气势所吓倒，慌忙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初，红三军团在坝口、长乐地区给敌军以杀伤后撤出战斗。并从石城撤退。这时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各军团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

我们从石城到长胜县走了3天。真是糟糕，由于上次手术不彻底，痔疮又犯了，团长还没有出院，我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继续往于都开进。

撤到于都以后，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红军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到哪里去他却没有讲。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从沉痛的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离不开毛泽东，红军离不开毛泽东，红军只有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作战原则，才能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但就作战来讲，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考验，得到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风更加顽强了。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 王平）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和部署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因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据伍修权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在后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说: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根据地正在缩小,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谈准备派他到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去,如果中央红军转移,红二十五军的压力就会更大。

随后,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他们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复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作转移准备,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从以上史料可以得知,自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首先,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1/3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15日,中革军委又发出训令,要求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进行的”。

其次,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

在此期间,地方党、政各级机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亦加紧进行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并规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下级机关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这一指示信、对战区、边区在“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做了布置。

其三,从人力物力上做了准备。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根据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与此同时,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兵员动员和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据伍修权回忆,当时兵工厂、印刷厂的机器都想带走,还有除了粮食以外的别的东西,“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其四,明确了转移的方向。据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像七八月间已确定要转移到湘西去。但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补充训令”中指示出来的。这说明,至迟在这时已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同其进行停火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党的民主革命篇

其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信号。9月29日,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又是很不充分的。

首先,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应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这些准备工作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保密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能保到连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连必要的政治动员也没有,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直到9月底,中央苏区已是岌岌可危,这时“左”倾领导者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传达。可是,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彭德怀即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李维汉也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干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就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由于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其次,在战略转变上犹豫不决。既然从5月份就开始准备长征,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变红军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可是自6月25日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又一面进行转移的准备,一面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争取大的胜利。这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绝望以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并于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提前出发。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第三,军事撤退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苏区还有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零都(今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之间隙,让部队在以上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按照原来的计划,也准备到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转移。但是,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于9月底10月初便仓促决定转移。从9月29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10日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匆忙了。至于各部队撤出防御阵地的时间,就更加短促。这样,就必然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恐慌。所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当时,对于谁走谁留,即长征时干部的去留问题,在掌握上是非常严格的。

据李维汉说: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

至于高级干部,则完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

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

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

当时的走与留,对他们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事实证明,像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着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而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去找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已决定将他派到零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由于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出发。在这种情

党的民主革命篇

况下,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另外,国家保卫局在走之前,对犯“错误”的五六十个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划分三类,一类杀掉,一类留在苏区,另一类可以随队出发。当保卫局长邓发带着名单,征求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意见时,叶据理力争,表示坚决反对杀人。就是在他的极力建议下,这批受“左”倾领导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的干部,才得以保留下来。

由此可见,每个人的走与留,是与博古、李德个人的好与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主力集中瑞金、零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

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局及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组成,负责人彭雪枫;第二梯队由军委总部第四、第五局及总政治处、警卫营、红军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罗彬;第三梯队由军委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附属医院组成,负责人武亭;第四梯队由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组成,负责人陈赓、宋任穷。其中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彭杨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毕士梯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营,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另有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千队),分指挥科、政治科等,属干部团指挥。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

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后为张经武、姚哲代理,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代号是“红星”,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军团部以省会名称作代号,红一军团叫“南昌”,红三军团叫“福州”等。

以上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8.6万余人,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曾日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第三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

十四师；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第九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黄火青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第二十二师。

另外，还保留了原来的中革军委和红军指挥机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统一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坚持斗争。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令，说明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在这之后敌人会深入苏区内部，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应该坚强而有毅力的继续领导游击战争，正确的发动领导群众，正确的运用游击战术”，主要斗争方式“不是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而应该把这些主力团营去培植、发展、辅助、团结群众的武装，缴获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与扩大自己”，“准备好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反攻”，并指出“为要适应着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应该时刻依照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组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正确的训令，但是由于发布的时间太晚，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布置，主力红军撤出后苏区处于混乱状态，给以后的斗争造成很不利的影响。陈毅在回忆中即说：

“这个退出，是逃跑主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而对于如何坚持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当时，虽然也留下了党的中央分局（项英同志负责）和中央政府的办事处（我任主任），但对整个苏区敌后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一时，苏区处于紊乱状态。”

中央红军撤离后，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为了掩护红军主力的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敌军深入苏区内部的情况下，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5年2月上旬，包围中央苏区的各路敌军，开始对瑞金、瑞西和雩都、登贤各县苏区进行所谓最后的“清剿”。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二十四师等部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具体部署是：红二十四师首先率领师部和第七十团，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委机关和项英、陈毅、贺昌等行动；中央军委参谋长龚楚（后叛变）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向湘南转移；陈潭秋、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去闽西，同张鼎丞等领导的部队会合，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李天柱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向赣粤边发展；毛泽覃率红二十四师

党的民主革命篇

1个连突围到闽赣边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六团在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的领导下，在雩都南部开展游击战争；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穿过敌军封锁线转向闽赣边发展。

从2月中旬开始，经过短时间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分路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包围已经形成，突围部队几经战斗，大部遭到损失，少数部队转移到赣粤边、湘南、闽赣边、闽西地区，会同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游击战争。随部队突围转移的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何叔衡、阮啸仙、贺昌、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李才莲、古柏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入狱，不久英勇就义。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中共一大代表，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院主席等职，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突围时壮烈牺牲。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春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2月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红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3月6日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贺昌，山西离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年9月被补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从1932年起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中壮烈牺牲。

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0月任中共公略县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后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年在反所谓“罗明路线”时被错误批判和斗争。红军长征后，任中央分局委员和独立师师长等职，1935年4月25日在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

万永诚，江西人，青年时代在上海纱厂当工人，参加工人运动，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后任中共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6月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4月10日在福建武平战斗中英勇牺牲。

李赐凡，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湘南农民起义，1931年冬起先后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等职。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任江西省动员武装部部长，同年秋代理江西军区司令员。红军